

文化战略

Cultural
Strategy

王岳川 胡淼森/著

文化战略

Cultural
Strategy

王岳川 胡淼森/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化战略 / 王岳川、胡森森著.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0.12
ISBN 978-7-309-07734-6

I. ①文… II. ①王… ②胡… III. ①文化事业—发展战略
—研究—中国 IV. ①G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31509 号

文化战略

王岳川、胡森森 著

出品人/贺圣遂 责任编辑/马晓俊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200433

网址: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常熟市华顺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960 1/16 印张 23.5 字数 331 千

2010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07734-6/G·934

定价: 3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化战略

目录

绪 论	001
第一章 全球化时代的文化战略问题凸显	005
第一节 “文化战略”解析	006
一 “文化”(Culture)	006
二 “战略”(Strategy)	008
三 “文化战略”研究的特殊指涉	012
第二节 全球化与中国文化战略问题凸显	013
一 本土文化认同感的迷失	013
二 新犬儒主义: 西方终结论背后	014
三 文化安全关乎整体国运	017
第三节 “文化战略”的学术史考辨	019
一 相关专著分析	019
二 相关期刊论文的学术史意义	021
三 该领域资料综述与话语结构	023
第四节 本书方法论与问题域	024





第二章 早期中西交流中的战略意识	031
第一节 误读异域文化是有意还是无意	032
第二节 以我观物思维对于文化交流的支配作用	036
第三节 礼仪背后是文化权力的争夺和文化主权的冲突	040
第四节 西方学者“以果证因”的文化优越感	048
第三章 “去中国化”：18 世纪以降西方现代性战略	050
第一节 流动的现代与中国问题域	051
一 现代化与东方文化之间的关系	051
二 现代以来的中国形象变迁	055
三 大历史视野下的文明走向问题	057
第二节 西方现代性战略导致中国文化形象跌落	060
一 中国形象：正负背后的同一机制	060
二 主体之人凸显与现代性伦理确立	063
三 中国文化形象跌落：一次现代性事件	065
四 浮士德式的选择与抛弃：美丽精神的失落	068
第三节 西方“去中国化”事件的文化战略学分析	073
一 话语渊薮：18 世纪中国形象跌落事件	074
二 不合时宜的他者：启蒙时代的“去中国化”话语	075
三 “自我去中国化”：“去中国化”话语的“中国化”	077
四 现代性与异端：“去中国化”话语的深层机制	083
第四章 当代大国文化战略举隅	088
第一节 美国：从文化冷战到文化热战	089
第二节 日韩文化国策及其挑战	095

第三节	普世性价值与大国文化方略	098
第四节	文化格局重组下中华文明何去何从	102
第五章	国际战略博弈下的中国文化安全	105
第一节	新世纪亚洲文化话语权争夺	106
第二节	当代中国的文化安全不容乐观	111
第三节	西方借文化战将中国妖魔化	115
第四节	中西方文化逆差触目惊心	118
第五节	中国当代艺术拍卖卷入西方文化战	122
第六节	战略天平上的汉语与英语之争	124
第六章	树立文化战略的地缘政治观	127
第一节	走出殖民主义文化观与重塑文化时空观	128
一	打破文化传播主义世界观	129
二	重塑时空观	131
第二节	大国崛起的文化资本和象征资本	134
一	从经济资本走向文化象征资本	135
二	消除“中国威胁论”的文化之路	137
第三节	树立太空文明时空观 迎接中国文化发展契机	139
一	超越线性时间观	139
二	大陆文明与海洋文明的辉煌期	141
三	太空文明时代的文化竞争	144
第四节	太空文明时代的中国身份反思	146
一	文化身份的重新确立	147
二	身份改写与确认的辩证关系	148





三	后霸权时代的中国文化身份与话语	150
第五节	太空文明时代的儒学价值重估	152
一	儒学与大陆文明	152
二	反思中国的海洋文明观	155
三	太空文明时代的后儒学价值	160
第七章	大战略思维下的文化守正创新	162
第一节	文化观映射下的文化创新问题	164
一	文化创新的本体论分析	164
二	工具论的桎梏：近代中国文化论争	166
三	世界文化有机体与文化“观相”	169
四	文化的时空问题	174
五	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文化创新瓶颈	181
六	创新：新世纪国家文化战略	184
第二节	太空文明时代的文化守正创新	189
一	经济崛起之后的文化创新问题	189
二	太空文明时代创新的价值立场	190
三	中国文化创新的精神价值	193
四	守正创新：回归经典进而创新经典	194
五	文化创新的原创性与多维性	197
第八章	创新之后的文化输出策略	202
第一节	文化输出迫在眉睫	203
一	时代催生发现东方与文化输出	203
二	发现东方与文化输出的紧迫性	205
三	文化在未来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208



第二节	文化输出的历史路标	210
第三节	文化输出中的中国话语	213
一	文化输出自我反思与问题域	213
二	跨国文化互通中减少误读与增进交流	215
三	在文化拿来中坚持文化输出	217
第四节	文化输出的创生性与自觉意识	219
第五节	文化输出与中国发展价值	223
一	文化输出的文化分层	223
二	文化输出的翻译性与文化性	226
三	向海外推出 300 种中国思想文化著作	228
四	向海外发行 100 集《发现中国》高清电视文化片	231
五	建立“新西方”中国文化学校	232
六	多维度、多渠道的输出策略	233
第九章	“再中国化”：中国形象战略转折	236
第一节	当代中国形象问题的凸显	239
一	形象学的定义、发展及争议	239
二	从西方镜像到中国形象	247
三	中国的大国形象序列	249
四	传媒化中国形象的反思	255
第二节	中国深度研究与国家形象重塑	257
一	中国角色与国际体系认同	257
二	后奥运时代的中国形象	259
三	发现东方与中国价值建构	261
第三节	从去中国化到再中国化的大国形象	262
一	去中国化的历史迷障	263



二 再中国化的文化方向	265
三 学界新潮：“再中国化”的未来	267

第十章 中国文化的战略远景展望

273

第一节 坚守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文化立场	274
一 全球多元化与中国本土价值	274
二 坚持文化对话中的中国身份	278
三 在古今中西之争中确立中国立场	281
四 身份立场下的理论模式转换	283
第二节 创造中西互体互用的和谐世界	284
一 超越东西二元对立模式	284
二 全球分享东方价值的意义	286
三 中西文化交流的主体性和开放性	289
四 中西文化的未来是互体互用	290
第三节 文化自觉与文化互动	295
第四节 中国文化的精神价值	299
一 文明的独特价值与生态和谐	299
二 互动哲学与中国文化精神	304
三 中国声音的世界性意义	308

文化战略案例之一：地缘政治视野中的中国西部文明

311

第一节 从“大国梦”失落到中国西部的再崛起	311
一 中国西部离世界的“近”和“远”	312
二 为什么中国的国都要从西部不断东移	316
三 在承载中国命运的西部整合新的文明	318
第二节 全球化语境中的西部命运	320



一	第二次地理大发现开始了新殖民主义	321
二	全球化时代中的新霸权主义	324
三	西部是中国整体形象的再造的契机	326
四	经济和制度全球化中的制高点	328
五	放眼欧亚大陆经济文化圈的中心地带	330
第三节	中国西南古代文明的当代意义	331
一	发现“中国两河流域”中“长江文明”的意义	331
二	寻找“失落的文明”与重释“夜郎文化”	333
三	坚持多元文化对话中的“大夜郎”文化景观	336
文化战略案例之二：传教话语背后的西方策略——以李提摩太的 宗教救华论为中心		338
第一节	李提摩太之入华	340
第二节	李提摩太在华活动	344
一	介绍西学	344
二	宣传维新变法,反对革命	346
三	鼓吹殖民有理,灭亡中国的金铎	347
四	教案与教育	348
五	其他活动	349
第三节	身前身后,众说纷纭	349
第四节	来自海洋的牧马者——李提摩太的心灵症候分析	353
附录：	李提摩太翻译的《天伦诗》	356
后 记		362

任何理论首先需要回答的是自己“出生”的合法性问题——之前为什么别人没有能提出类似的理论，为什么这一理论偏偏要诞生于此而非另一时代？每一个哲学家、思想家首先必须面对自己的时代，无论其对于所处的时代是赞扬抑或是诅咒，其本人无可逃遁的命运在于：只能立足在这个时空点上发言和思想。一种哲学、理论和思潮无不烙下了时代的鲜明痕迹，甚至大多数思想和写作的人们，都有一种自觉的时代意识，即认为自己所处的时代是“独一无二”的。

回顾人类的哲学史和思想史，能找到不少这样的例子。黑格尔从马背上的拿破仑身上看到“世界精神”，从而创立恢弘的辩证法体系；康德曾为自己作为法国大革命的同时代人感到骄傲；马克思对于工人运动兴起的准确把握，以及对资本主义未来的预言，隐含着对自己时代的高度自信；尼采揭开苏格拉底以降的哲学骗局，公开宣告了一个上帝死亡的时代到来；利奥塔关于后现代知识的报告敏锐地发觉了“宏大叙事”消解的现实；福柯对权力“话语”的窥视；赛义德对“东方”的审视；德里达对“逻格斯”的质疑……在这些思想家的内心深处，都隐含着一种鲜明的“时代感”——认为自己所处的“这个”时代是无法替代的人类历史转折点，是旧时代的终结，或新时代的滥觞，在这个时代出现的种种问题，是其他时代所没有、所无法





面对或难以解决的新“现象”^①。

这种时代感并非思想者的局限性,这种自信不断被超越、颠覆,却又一代代延续着并重新书写,其中隐含着的问题恰恰在于:一代知识分子应该也只能面对属于自己生活着的这个世界的特殊性。因此,恢弘庞大的哲学大厦和璀璨万分的思想宝库,所提供的却往往是一种类似的“模板”,而经过时间的流逝后,产品本身对于当代人而言却变成了过时的。

文化问题更是如此,“创新”与“守成”永远是一对相互敌对却又无法分离的矛盾体,“复兴”与“复古”也往往出现悖论与冲突。最理想的解决办法似乎是不法古人之定法,唯法古人之创新精神,即沿着古人的“形式”,抛弃过时的“内容”,然而这样似乎又陷入了逻辑悖论——“形式”与“内容”的二分法本身就是古希腊以来根深蒂固的一种思维,且在西方现代美学和文论的冲击下已立不住脚。

那么,能否采用另一种方式:即效法古人对自己时代的重视,以负责的思想者或知识传承人的态度来对待自己所处的时代。个人,包括思想家对于时代的判断往往会“失真”,1989年,福山宣布历史终结以后,历史却并没有就此终结,“9·11”事件重新将“文明的冲突”这一话题引向前台。每个人都 very 珍惜自己的时代,这是作为个体生命的内在延续和传承的冲动使然,然而时间却不断证明这一悖论:往往“终结”的时代继续发展,“结束”的时代死灰复燃,“垮掉”的时代产生真正的思想,而“盛世”的时代却往往沦为一潭死水。

每一时代的人总会面对自己的特殊问题,每一代学人的问题域也有所侧重,无法复制到下一代。康德的时代关注启蒙,马克思的时代看到的是革命对人类未来的能动作用,福柯的悲观主义造就了他对于“权力”和“话语”的特殊关注,新批评兴盛于二战后的保守主义时期,而文化研究则标志着知识分

^① 西方学术语境下产生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毫不奇怪,追溯到黑格尔那里,他甚至认为1806年拿破仑与普鲁士的耶拿战役之后,历史已经走到了尽头;东方代表开端而西方意味着终结,线性历史观映射下的东方自然成了停滞和重复的代表,同不断走向新的“终结”的西方形成了鲜明对比,福山本人就自觉意识到了黑格尔思想的重要性,认为“黑格尔是最先严肃处理印度、中国等欧洲以外‘不同人民之国民史’的欧洲哲学家之一”,遥远的中国被黑格尔描述为“没有时间只有空间”的国度,显示出欧洲哲学家鲜明的“时空本位”立场。参见周宁:《天朝遥远: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61页。



子群体与政府之间关系的重新定位。

以哲学、美学、文学批评和理论著作中出现的“论据”、“引证”或“材料”为例,可以看出各个时代的学术思想着眼点有着鲜明的差异,18世纪有康德力图为人类知识划界的三大批判,黑格尔跨越时空国界的“绝对精神”;19世纪有《资本论》中井井有条的政治经济学调查数据,丹纳等文学批评家则结合人种、气候、地理论述文学特征;20世纪中期前后,形式主义和新批评充斥着索绪尔以降语言学尤其是语音学的最新研究成果,而到了解构主义的时代,“语音中心主义”则成了禁锢思想和写作的罪魁祸首。每一代学者、每一本著作中的“材料”只是属于那个时代的特殊“对象”,在下一个时代经常会出现“过时”或“失语”的问题。

借用美国科学哲学家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一书中提出的自然科学“范式”(paradigm)概念,我们可以将人文和社会科学的“进步史”视为“范式”更迭的历史。库恩的“范式”概念与福柯提出的“话语”(discourse)概念具有类同性,不同的是后者更多强调权力与文化的共谋,而“范式”则强调一门学科内部的“科学共同体”对于方法论的选择问题:和政治革命一样,“科学革命也起源于科学共同体中某一小部分人逐渐感觉到:他们无法利用现有范式有效地探究自然界的某一方面,而以前范式在这方面的研究中是起引导作用的。在政治发展和科学发展中,那种能导致危机的机能失灵的感觉都是造成革命的先决条件”^①。

对于人文科学而言,“范式”提醒人们: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语境下,学术要处理的问题、材料和其所延伸的外延都是不同的。全球化是在15世纪以现代资本主义的形式诞生的(中外全球化研究者多将端倪追溯于此),然而对于20世纪中期以前所有的美学家、文学家和哲学家而言,“全球化”是一种“没有经验过的经验”,19世纪以前的学者从来没有像今天的学者们那样体会到全球化的无所不在,没有经历过跨国公司对于民族空间边界的超越、民族国家权力的衰亡、全球化话语掩盖下文化同质化的危险、边缘文化被消费主义或灭绝或包装的尴尬。康德的“永久和平”论在今天似乎获得了部分的

① [美] 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实现,但却是以全球文化沙漠的无限扩张为代价的。

对当代中国学者而言,必须面对全球化时代本土文论的“范式”转向和创新问题。生长在这个时代的人,无论对其所抱的态度是悲观主义还是乐观主义,都不得不立足于固有时空点上发言发声,沿袭古人引用过无数遍的材料,重复反复使用过的概念,沿袭早已无可置疑的重言式方法论,其本身只是一种知识的传承和保存工作,而不具备前瞻性和创造性。学科自身的发展必须依赖于“范式”的变革(尽管“科学革命”在库恩那里并非绝对善意的概念)或者“突破”。我认为:全球化时代的文艺理论必须处理文化政治学的问题,意识到文论和文化与政治权力话语之间的复杂关系,将原本割裂的文化美学问题与政治外交问题联系起来,引入大文化视角来重新审视本土文论及文化的形象、命运、生存策略和创新问题。

全球化时代的文化战略问题凸显



人类所有文明都处于同其他文明的竞争关系之中,通过自身视角参与构筑世界文化地图。近代以来的中国对于世界文化局势和文化体系的认识,往往受西方思想家的影响很大,而缺乏自我构筑人类文化地图、预见文明走势的宏大视野,由此产生的问题就是:将近代以来东西方竞争中,西方通过一系列政治、经济和文化手段取得的优势地位视为先验注定的结果,进而导致对于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诸多本质化理解。中国学界亦有一种定势思维,即中国的思想与学术永远只能是在给定的西方游戏规则下的局部“实践”,不具备理论创新的可能。我们应该反思:今天的文化地图既然是文化交流、竞争和冲突的结果,那么东西方不同的“文化战略”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如果对中国文明的“文化战略”有意识地加以改进与强化,是否可能以更为强健的姿态参与构建新的当代世界文化图景?

对“文化战略”问题的忽略,折射出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人文学者对于“文化战略”问题的漠视,迄今为止这一问题几乎成了国内社会科学的专属领域,严重缺乏人文学者的声音,人文知识与国家文化的整体命运成了自说自话、不相往来的两条铁轨,这种现象无疑是不正常的。国家的文化整体命运不仅仅是学术问题,更是关乎盛衰兴亡的国际政治问题。在此情况下,引入文化政治学视角,将人文学关注的领域扩大到“文化战略”领域,不仅有助于加强“文化战略”研究本身的学理性,更重要的是,重构文化、学术、政治与民



族之间的关系,为人文研究提供新的学术生长点。

第一节 “文化战略”解析

一 “文化”(Culture)

人类与文化相伴而生,文化自诞生之日起就包含时空维度,不同时代和地域具备各自的文化特征。因此,文化是最难取得共识的概念之一。美国有学者曾统计过文化的概念或定义,从1871年到1951年间即有164种。一般认为:文化包含精神和物质两方面的含义。按照泰勒(Edward Tylor)《原始文化》(*Primitive Culture*)的说法:“文化是一种复杂总体,包括智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人类在社会所得的一切能力与习惯。”对于文化所包含成分的分析,还有Ratzel、Müller、Wissler、Hankins等学者,他们都将文化视为物质产品与精神产品的结合。

根据陈序经的考察,“Culture”或德文的“Kultur”一词,本由拉丁文“Cultura”而来,其词源为“Cultus”,后者有两种含义:一是“Cultus Deorum”,包含拜祭神明的意思;二是“Cultus Agri”,包含耕作土地的意思。而耕种和种植的含义,在16世纪时被引申为培养和教育。陈序经借此两种含义说明精神和物质两方面的含义^①。一些当代学者认为,不仅要区分日常生活意义上的文化与学术意义上的文化,也要区别大文化与小文化,前者泛指一切“人化”的东西,后者则特指精神文化与思想文化,这体现了对于精神和物质两方面的兼顾,显得较为科学^②。

中西学者的文化分析蔚为大观,但人们在定义和考察文化时,很容易将文化视为外在于人自身的某种“成果”或“对象”,也即是说将文化视为现存的

① 陈序经:《中国文化的出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9-50页。

② 柴文华:《现代新儒家文化观研究》,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7页。



某种东西,注重其对象特征;相对而言不太重视文化作为人类生存和存在方式的过程特征。

在诸多关于文化的著作中,荷兰学者C·A·冯·皮尔森(C. A. Van Peursen)出版于1970年的《文化战略——对我们的思维和生活方式今天正在发生的变化所持的一种观点》(*The Strategy of Culture*)对于文化问题的认识令人耳目一新,本书中译本出版于1992年,然而在中国学术界的影响不大。作者在书中将“文化”与“战略”联系起来作了全新的定义和解读,对于我们认知“文化战略”问题有较大的启发。

关于“文化”,皮尔森首先指出文化概念的变革主要来自于时代语境的变化:那就是“文化问题并不是理论思考的目的本身;对它的分析应当有助于形成一个指向并着眼于未来的文化政策”,这就是所谓“文化问题的工具化”。在这一前提下,文化概念经历了变化:

(1) 文化概念扩大。文化从前代表了(有着高度文明的)“文化人”与(较原始的)“原始人”的区别。近来,文化开始被看作“人的生活方式的表现”。

(2) 更重要的一点在于,皮尔森提出对于文化的“富有动态性的解释”:

“文化”这个术语与其说是名词,不如说是动词。它主要的不是意指包括诸如工具、图画、艺术作品,更不消说是博物馆、大学楼、税务所等在内的客体或产物,而是首先意指人制造工具和武器的活动;舞蹈和念咒的礼仪;以及与性爱、打猎、准备食物相关联时的各种行为模式。文化的一个方面是传统,即所有物和规则的传递,然而这种传统是包含在人的活动的变化之中的,是包含在现有文化形式所体现的无数变化和发展的可能性之中的。^①

皮尔森的文化观念与冯友兰先生在“论‘比较中西’”一文中的文化观有惊人的相似:“中国人一日不死尽,则中国文化及中国国民性即一日在制造之

^① [荷]C·A·冯·皮尔森:《文化战略——对我们的思维和生活方式今天正在发生的变化所持的一种观点》,刘利圭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页。